

湖北省志 资料选编

第三辑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省志总编室编

湖北省志资料选编

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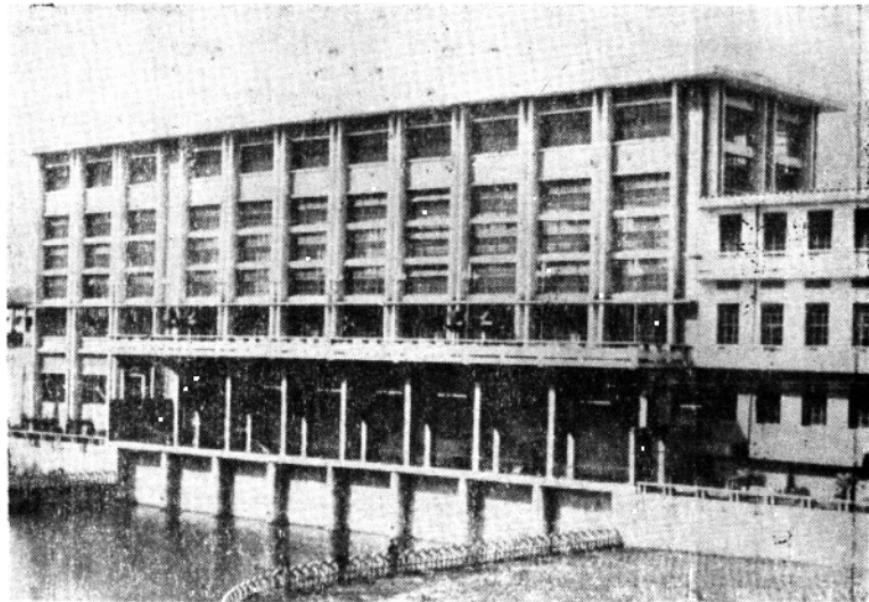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省志总编室编

一九八四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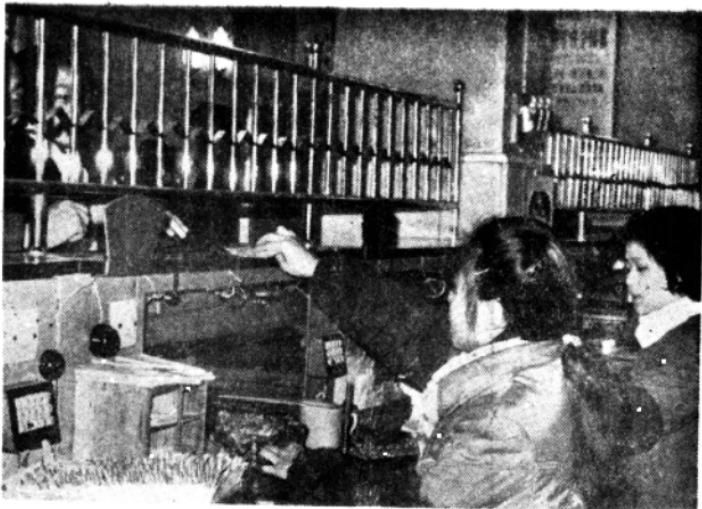
本辑责任编辑：赵慧
编纂：方向明 王钢
余玉鹏 陈章华

湖北省志资料选编
第三辑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省志总编室编
(内部发行)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1984年9月出版



樊口泵站位于鄂州市雷山脚下，三面环水，背靠长江，为我省较大的电排站之一。1980年正式运行以来，排水十六亿立方米，对鄂城、大冶、武昌等县农、牧、渔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权超摄）



人民银行武汉市江岸区车站路储蓄所被省行评为“文明储蓄所”；省委、省政府授予该所“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最近，该所改革了内部工作程序，实行了百元以下业务个人负责制，减少了储户在柜面等候时间，方便了储户，深受欢迎。

（周雨及摄）



我省土家族人民热情好客，常以油茶汤款待客人。

（邓忠富摄）

目 录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

三十五年来湖北省水利事业的发展	郭永金 (3)
建国后蓬勃发展的湖北汽车运输	沈典芳 (12)
我省城镇储蓄工作三十五年	张广春 (19)
建国以来湖北省教育事业的伟大成就	程光华 (25)
湖北农村的历史性变革	陈 骥 (36)
把鄂西建成先进自治州的优势	张明修 邓永贵 (49)
湖北省的智力资源及开发利用	殷冰侠 (57)
发挥我省纺织工业优势	段辉敏 (77)
借鉴历史，发挥湖北水运优势	庄子同 (85)
“裕大华”与日本“泰安”的一场争存亡的斗争	芮世玉 (89)
周恒顺机器厂的沿革变迁	杜哲兴 (96)

- 近代湖北武汉贸易行栈述略 曹兆祥 (108)
- 建国前湖北的保险业 邬耕强 (118)
- 三峡水利工程与文物古迹 省《文物志》编辑室 (129)
- 李四光与湖北早期的地质工作 阎久祥 (133)
- 鄂西南的土家族 白崇华 (138)
- 名冠全球的坝漆 蔡大干 张丰云 (147)
- 湖北民间歌舞 邹小燕 (152)
- 武汉早期的足球运动 曾子沈 (177)
- 编 后 (182)

三十五年来湖北省水利事业的发展

郭永金

湖北，曾经是“三年两旱，十年九淹”的省份；而建国35年后的今天，水利建设已取得辉煌的业绩，深刻地改变了江湖旧貌。过去那种水、旱灾荒频频为害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再复返！

丰富的资源 频繁的灾害

湖北是个江河纵横，湖港密布，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全长6300多公里的长江，在湖北境内有1200多公里；汉江全长1500多公里，湖北境内就占970余公里；此外，全省有中小河流1193条，大小湖泊1000余处。丰富的水资源，给人们以灌溉、航运和综合利用之用。从京山县屈家岭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稻谷、稻壳来看，早在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学会用水种稻；到公元前六世纪，即距今2500多年以前，就出现了据传是楚相孙叔敖组织开导的、沟通长江沙市一带到汉江沙洋一带的运河。

但是，由于降雨量的三个分布不均：首先是地区间分布不均，鄂西北多年平均年雨量为800毫米，而鄂东南和鄂西南则可达1400—1600毫米；第二是年际间雨量可相差四、五倍，如襄樊雨量时间较长的汉口站，1880年雨量2107毫米，而1992年只有576.4毫米；第三是一年中雨量大多集中在汛期，如汉口4—8

月五个月雨量占全年总雨量的三分之二，其中5—7月三个月又占全年雨量的45%。而雨水多的月份，降雨往往集中在某几天，如1959年汉口曾一天降雨330.8毫米，占汉口多年平均年雨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因此，暴雨集中时，就洪涝为患；雨过天晴，稍长时间无雨就易干旱。1935年全省绝大部分地区洪涝成灾，就是特别集中的暴雨造成的。以鄂西五峰县为例，这年该县全年降雨2577.9毫米，其中1360.4毫米集中下在7月上半月，在这15天中，最大一天降雨422.9毫米，三天达1076.1毫米，七天达到1318毫米。而暴雨过后，部分地区又发生大旱。

此外，湖北地处长江中游，中上游的巨量过境客水，还给沿江人民带来严重洪害威胁。以武汉为例，它以上的148.8万平方公里的承雨面积中，就有136万平方公里是外省客水。1954年通过武汉关的年迳流总量为9683亿立方米，其中属外省客水为8673.6亿立方米，占过治总水量的89.57%。在抗御这巨量洪水中，任何一处堤溃口，都会造成范围不等的毁灭性灾害。

为除水害，兴水利，我省人民几千年前就开始了挽堤为境和开渠筑塘等水利建设。公元前279年，秦昭王会白起攻楚，白起引水灌鄢城而开凿的水道，经历代不断改进，成为今日宣成长渠的前身；东晋永和年间荆州刺史桓温令陈遵在万城修堤两段，共约七里许，即今荆江大堤建筑的肇基。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二千多年的时间，全省只留下矮小单薄的一万多公里的江河民垸堤防，和一百多万亩塘堰，难以与洪涝旱灾抗衡；加之人口不断增多，生产范围日益扩大，洪涝旱灾为害也日益频繁。以长江水灾为例，从汉初到元朝的1553年间，平均11年一次；明代276年间，平均9年一次；清代267年，平均5年一次；而1911—1949年的39年间，大小水灾37次，其中较大水灾10次。1931年大水，全省70多个县有45个县受灾，武汉被淹百日，街道行船；全省受灾农田2753万亩，受灾人口1000万，其中8万人死

于洪流。而大旱和局部旱灾，仅1801—1949年，就发生过88次。1934—1936年连续三年大旱（其中1935年7月还发生大水灾），广大丘陵山地，赤地千里，饿殍为野。因此，直到1949年，湖北全省5592.5万亩耕地（其中水田2656万亩），灌溉面积只800万亩；排水面积只206万亩；保收面积仅462万亩。农业生产主要是靠天收。

除了水旱灾害之外，由于江湖连通，渍水泛滥，传播吸血虫病的钉螺分布到44个县，面积达600余万亩，吸血虫病患者解放初达180万人。尤其是阳新、汉阳等重疫区，妇女不育，人口死亡率高，劳动力极弱，确是“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凄凉景象。

筑堤防洪 关好大门

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我省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成绩卓著的水利建设。目前，全省农业生产条件已得到显著改善，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我省江汉平原人口集中，大小城镇、工矿企业和交通干线密布，是工农业生产发达地区，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正是这个重要之地，受着巨量的过境洪水的威胁。每年汛期，防洪安全成为这一地区人民生活和经济文化繁荣的前提条件。

1949年人民解放军刚解放长江、汉水沿岸城镇，就碰上较大洪水，干部战士放下背包就投入防汛抢险。防洪建设突出地被提到人民政权的议事日程。

1952年，正是百废待举的时候。为防治荆江水患，党中央、政务院作出了兴建规模宏大的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以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总指挥部总政委李先念为首的30万军民，以忘我精神，创造性劳动，投入了战斗。在黄天湖排淤筑堤时，某营600多名战士下湖，被野菱角刺扎了脚的达510多人，有24人被刺拉

开了血口，但他们毫无畏惧，终于用手、面盆等一把一把地把淤泥掏净，使大堤稳稳地穿过湖心。在挑土竞赛中，战士戴国发在119米运距内，创日运土16立方米的纪录。在轻便铁轨线上，宜昌地区18岁的女工谭云翠为与洪水争时间，一连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夜里昏倒在下坡的轨道旁，后面奔来的车压断了她的左手，当她醒来时，仍不顾痛苦地说：不要管我，赶快前进。工程师李芬、王咸成等改进设计，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器材。就这样，他们克服施工条件艰苦，时间紧迫，交通不便，以及技术水平较低、雨日过多等种种困难，仅用两个半月的时间，就建成了有54孔、长1054米的太平口进洪闸和有32孔、长336米的黄山头节制闸，完成了可蓄水60亿立方米的分洪区围堤和133公里的荆江大堤加固工程。

荆江分洪工程胜利完工后，又先后完成了汉江杜家台分蓄洪工程、东荆河下游和举水出口等处的隔堤工程，普遍加高培厚了荆江、武汉等地的江河堤防。同时，沿江堤兴建了一大批排灌涵闸，起到了除害兴利的作用。特别是对保护范围约18000平方公里，耕地1100多万亩，人口800多万的著名荆江大堤，除普遍进行加高培厚、整险加固、消灭隐患、填塘固基、护岸保滩等建设之外，为减轻荆江大堤的防洪压力，从1964年开始实施了下荆江系统的中洲子、上车湾等裁弯取直工程，共缩短河道80多公里，大大增加了上荆江泄洪能力；七十年代以来，荆江堤大加固又纳入国家基建计划，按当地最高洪水位超高2米的标准，进行加高培厚，并在荆江南北安排了巨大的分蓄洪区，大大提高了抗洪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省抗洪状况。

在旧社会，腐败无能的统治者在对付不了洪水威胁时，总是借助于苍天，乞灵于神仙。1935年7月，荆江沙市段洪水陡涨，江陵县保障垸堤防溃口，万城堤工局负责人吴锦堂逃跑，导致抢险民工四散和荆江大堤谢家倒口、得胜台、横店子相继溃决；荆

江大堤堤工局长徐国瑞不领导群众奋力抢堵，却在沙市东湾堤上旋办“三牲”，率众演出了民国时期的“祭江”丑剧；正当他们向江水哀求礼拜之时，江南干堤罗家潭、荆江大堤麻布堤等处又告溃决，造成了我省又一次严重洪灾。而1954年夏季是全球性大水季节，洪水灾害遍及欧亚美洲，就是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在动用了千万吨钢铁、水泥和大量防汛器材之后，也未能阻止淹城。可是，长江之滨的武汉，这年洪水比1935年大，比1931年水淹全市时还高，武汉人民凭借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全国各方面的大力支援和建国后整修加固过的防洪工程这个物质基础，硬是战胜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谱写了一曲人可胜天的凯歌。此后，又过经年复一年的建设，长江干堤现已普遍高出1954年当地最高洪水位1—2米，面宽8—12米以上，汉江、东荆河堤高度普遍高出1964年当地最高洪水位1米以上，堤顶面离6—8米。经过1954年以来多次较大洪水的检验，取得了防洪保安全的显著效益。1980年汛期，长江监利、汉口、小池口等处长期处于警戒水位以上，武汉关最高水位高出武汉市一般地面3—5米，超过1931年武汉堤防溃口淹城水位0.82米，而沿江城乡人民全都平安无事。1981年7月，长江上游普降大暴雨，宜昌、沙市等处洪峰流量都超过1954年，但荆江以上总长2000多公里的江河堤防，没有一处溃决，确保了沿江人民生命财产及工农业生产、建设的安全。

108

拦河建库 除害兴利

当巨量的客水被加固一新的大堤“关”在堤外之后，省境内大小溪河的山洪危害，便成为河流两岸及其下游平原的重要威胁；而易涨易落的“山溪水”过后，稍长一段时间无雨，丘陵山区的干旱更是被突出出来。特别是1952年建国之后的第一大

旱，深刻地告诉人们蓄水保水的重要。1952年冬，当时的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先念亲自挂帅，开工建设我省第一座较大水库——麻城大坳水库；次年7月，水库胜利建成，从而为在我省拦河建库开辟了道路。大坳水库的经验告诉我们，兴修山谷水库，既可拦蓄山洪，使其不致进一步造成山洪灾害和平原湖区的渍涝，又可把多雨时的水蓄起来，以备干旱少雨时灌溉和其它之用，既除害，又兴利。因此，自此之后，全省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流域踏勘规划，选定了一批宜拦河建库的点。到1958年，人民公社的成立，为大规模调动劳力创造了更方便的条件，而1959年的大旱又进一步显示了“水”的重要，从而大大促进了以兴修山谷水库为主要内容的“修水库，保增产”的水利建设。据统计，在我省35年来建成或基本建成的268处大中型水库中，约三分之二是1958—1966年这一段时期上马或建成的。

在较短的时期内，兴建了那么一大批山谷水库，没有什么大的失误，而且大都发挥了较显著的效益，除主要河流都作过勘测规划，保证了宏观决策的正确外，主要是各级党政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人民群众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注意工程施工质量的结果。

建国35年来，全省除沿江建成690余处灌溉涵闸，引水灌溉能力2144秒立方米外；建成大小水库6287座，塘堰110余万口，总蓄水能力480亿立方米，其中兴利库容250亿立方米；在引、蓄水困难的地方，建成电力提灌站9014处，装机1.1万多台、65万多千瓦，提水能力2500秒立方米。以上总计，全省引、蓄、提水灌溉能力达300亿立方米以上，为抗旱增产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1978年，我省遇到1902年以来七十六年间最严重的干旱，4—9月降雨量比正常年份偏少一半左右；全省受旱农田3200多万亩。当时，全省80%塘堰干涸，许多河水断流，不少中小水库蓄水放光。就在这种情况下，全省仍有900多处水库能自流放水灌

溉，其流量达1000秒立方米以上，前后共为农田提供灌溉水量78亿立方米；同时，沿江涵闸引水70亿立方米，机电提水63亿立方米；总计蓄、引、提水211亿立方米。这二百多亿立方米水量意味着什么？据荆门县调查，在这种大旱之年，基本上是“一方水，一斤粮”。该县1961年大旱，由于水利设施差，粮食总产仅1.6亿斤；1978年这个县连续干旱近200天，全县引、蓄、提水8.3亿立方米，使161万亩农田免除旱灾损失，粮食总产达11.26亿斤，比1961年多收9.6亿斤，平均一方水多收1.15斤粮。而据科学实验，生产一斤稻谷需水0.7—1立方米水，考虑到输水途中的水量损失等因素，一方水一斤粮，大体也是正确的。按此标准计算，1978年全省提供抗旱用水211亿立方米，相当于保收210亿粮食，价值为21亿元。这一年抗旱耗电4亿度，耗油20.5万吨，加上设备购置及运输费用，共开支约3亿元。这个代价虽不算小，但同总收益相比，经济上仍是合算的。

建泵站，排渍涝，消除内患

平原湖区经过加强堤防建设，关好大门，初步防止了外来洪水为患；丘陵山区经过兴修山谷水库，减少了平原湖区的山水汇入和渍涝威胁，平原湖区的水旱灾害与农业生产发展的矛盾，有了一定的缓和。但是，由于平原湖区地势低洼，江堤上虽然兴建了一些自流排水涵闸，可在冬春向外排水，而每当汛期，外江洪水上涨，每年5—9月江水位往往高于内湖和河渠水位几米到十来米，使内水不能自流外排，常常造成大面积渍涝。如1989年7月的集中暴雨，鄂东和江汉平原大部分地区，十来天降雨近1000毫米，尽管能运用的排水设施和小型机械设备都发挥了最大能力，但由于自流出不去，提排能力弱，平原湖区白茫茫的一片，酿成严重的内涝，农业生产发展受到极大影响，全省粮食总产降

到205亿斤。现实使人们认识到，要想彻底摆脱渍涝灾害对农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必须建设大型电力排灌工程。而这时丹江口水电站的投产和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也为兴建这样的工程提供了电能与设备供应方面的条件。因此，我省电力排灌工程建设从此在江汉平原蓬勃兴起。据统计，湖北全省现有的上百处大型电力排灌站，除三处是1970年前建成的外，其它都是这一时期动工兴建的。全省电力排灌装机总容量1983年底达到136万千瓦，其中80%以上是近十年发展的。

过去是“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沔阳县，1970年开始兴建排湖电力排灌枢纽，该工程除安装九台套大型水泵电机的主体工程外，还包括一座11万伏变电站、一个渡槽涵闸和欧湾排灌闸、五处节制闸及一条电排河；这是一项排水与灌溉、提水与自流、排地表水与排地下水、水利与灭螺、交通、水产、绿化相结合，高低分排，上下游兼顾的复杂工程体系。目前，该工程又开始向自动控制运用进军，并取得了初步的可喜成果。目前，该县大小电力排灌站120余处，装机6万多千瓦，1980年该县渍涝比1969年严重得多，由于全县电排站及时抢排渍水，这年粮食总产仍有9.4亿斤，比1969年的4.7亿斤增长一倍。

从全省来看，1980年夏季，江汉平原各地先后下了13次大到暴雨；同时，长江、汉水又出现高水位顶托，大有渍涝成灾之势。但由于全省电力排水站以日排3亿立方米的速度加以排水，总计提排渍水达234亿立方米，相当于43个洪湖正常容积，终于使1954万亩渍涝农田中的1340多万亩免除了灾害。这年的农业生产与渍涝程度相当的1969年相比，粮食产量多102亿斤，棉花产量多48万担，油料多126万担；粮、棉、油总产值比1969年增加约12亿元。湖区群众深有感触地说：“享的是共产党的福，吃的是大泵站的饭。”

光辉的成就，伟大的转变

建国35年来，到1983年底止，全省不仅合并、整修、加高、加固了现有的9324公里江河民堤，整修、改造、配套、完善了116万多塘堰，使许多有名的古老工程经过修复、扩建，旧貌换新颜；而且兴建了大批过去所没有的新的工程。如新建大型分蓄洪区两处，沿江建成排灌水闸2281座，建成或基本建成大小水库6287座，其中大型47处，中型221处，总库容相当于每年降在我省境内全部河川迳流的一半；建国前，全省没有一处电力排灌站，也没有一处水力发电站；35年来，全省建成固定的机电排灌站15149处，装机21388台、209万马力，其中电力排灌站10013处、装机16360台、136万千瓦；中小水电站建成2873处、装机68万千瓦。与此同时，全省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309平方公里，占流失总面积的59%；改造低产田994万亩；平整土地1261万亩。通过这些措施，使全省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到3498万亩，为1949年的4倍多，占总耕地面积的63%；初步除涝面积1787万亩，几乎为建国前的9倍，占易涝面积的83%；旱涝保收面积2600万亩，为1949年的5.6倍，占总耕地的47%。正因为有了这么一个较好的水利基础，才使得我省农业能够战胜一次又一次的水、旱灾害的袭击，确保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除此之外，结合兴修水利，消灭钉螺500多万亩，占有螺面积的80%；结合水利施工，全省共修建公路或简易公路8000余公里，其中已有一部分正式移交交通部门管理使用；在一些原是江河联通的地区，实行江河分家后，结合修建了船闸，如汉北地区，现有大小船闸七处，基本做到了江、河、湖区航运畅通；在其它一些地方，特别是大型水库库区，航运条件显著改善。而通过农村电力排灌建设和小水电建设，大大促进了农村电力化事业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省水利事业的发展进入了“加强

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进行了或正在进行着一些重要的调整与改革，解决了或正开始解决水利事业中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促使全省水利工作发生了深刻变化。

首先，通过认真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逐步控制住了水利基本建设一度无法控制的势头，从而扭转了一般不认真论证成本、效益，工程越上越多，尾巴越施越长，资金、设备、器材愈搞愈紧张，群众负担越来越重的被动局面；开始对已建工程进行全面清理，除险加固、续建配套，扩大效益；对确实需要安排的新的骨干水利水电工程，加强了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研究和勘测设计等前期工作，从而为提高经济效益奠定了基础。

再是在水利建设方式上，开始认真实行合理负担，各方集资，小型为主，当年受益的办法，促进了水利建设的新发展。过去一段时期，水利建设一方面靠政府无偿投资，另一方面靠“一平二调”群众负担，结果形成搞建设的千军万马，国家、集体、群众负担都重，搞管理吃大锅饭，喝大锅水。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改变这种局面，从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出发，定项目讲究工程实效，组织实施，除公共工程、社会福利性质的完全由国家负担外，一般实行多受益多负担，少受益少负担，不受益不负担的政策，使大小工程都能比过去更好地进行建设。如1982年度汉川县河湖河网疏挖工程，尽管有320万土方，又未列入省里计划，由于县政府采取合理负担办法，动员10万劳动大军，奋战两月，做到了河成、堤成、路成、林成。枣阳县从建国到1981年，累计建成电灌站253处、363台，9280千瓦；而1982年一年，全县自筹资金361万元（含贷款）、国家补助89万元，建成电灌站263处、316台、10464千瓦。一年胜过了三十年。

三是开始切实加强对现有水利工程的经济管理，充分发挥工程的效益。过去由于责任制不明，管理上吃大锅饭，用水时不讲经济效益。三中全会以来，狠抓经济效益，成本核算，调动了各